

一、抗战初期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(1937年——1940年)

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是晋西北之南大门,在离汾公路线上,东至交城山,西与陕甘宁边区相依。其中军渡、孟门,也是党中央、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之交通要道。离石四区处于离方、离临两条公路线之间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因此,我党和敌伪对这块地方都很重视,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。

1937年春,离石来了牺盟特派员阎景纯,四区派来牺盟秘书薛丕华,他们就是该县区共产党的负责人,一来就宣传抗日,发展牺盟会员,我和雒贵岐、阎良田等同志参加了牺盟会,雒贵岐同志为组长。丕华同志让我到店坪编村帮助村政权搞统战,开展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。后来在会中吸收了贵岐、良田(当时良田在阎家坡编村活动等同志)为共产党员,我区党的组织建立从此开始。

同年秋,续范亭先生为主任,南汉宸、程子华等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,因太原日寇轰炸而转移离石,在发动群众方面也起了应有的作用,还给我区派来刘兴帮任区长。

11月8日,日寇进攻太原。阎锡山一枪不发,弃城南逃,太原被日寇占领。阎匪溃兵沿途抢掠,退到哪儿,抢到哪儿。当时我在茂塔坪教书,被溃兵把我拉走,巡田的吴丑儿追到盛地,花了二十元银洋放我回校,结算工薪归还了丑儿,只好赤手回家。回家后,发动邻居打崖窑,准备空室清野,以防阎匪日寇抢掠。不出所料,阎锡山的溃兵二百余人马,就到我东社村盘踞九日,家里的粮食财物全部抢空,还把村外避雨窑藏的群众所带之衣物抢光;有的群众没走脱被打致残;数九寒天大雪封山,产妇野外生娃,母子都留下后遗症。直到溃兵走后人们才敢回家,只见面面都被溃兵们在院里喂了牲口,我父亲驮炭的那头瘸毛驴也被拉走,致使村民过春节无衣无食,饥寒交迫。

1938年3月9日(农历正月二十五日)凌晨,日寇侵占离石城。14日鬼子来到四区牺盟会所在地大武镇。17日开始大屠杀,共杀害穆成仓、穆成库兄弟等三百六十余人,如李儿则全家五口都杀绝。其残杀手段,真是惨不忍睹。窑则场、石坡壕、油房沟血流成河尸成山。日寇血洗大武镇的血债,全县人民世代难忘。当时阎匪三十五军就驻扎在大武,却避而不战,坐视日寇残杀人民,占据了大武镇。

我区牺盟会转移到马头山后,在雒家庄一带坚持工作,共产党员雒逢钦、张炳等同志,通过合法形式,组织农协会,发展党员建立地下支部,宣传十大纲领,开展合理负担、减租减息运动,发动和组织群众与破坏合理负担的阎伪村长刘汝彩、山后虎武俊杰展开游行示威斗争。对土豪劣绅李岐润召开说理斗争大会,使其低头认罪,交出合理负担的粮款。但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伪区长吉清廉,密告伪县政府反动县长戚振华,将阎良田、雒逢钦等同志逮捕入狱。后以雒

贵岐等同志为代表的全区群众签名请愿,伪县政府被逼才先后释放了我们的同志。

同年冬,我在李家山任小教,贵岐叫我在该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、合理负担,地主密告伪县政府,当时县教育局长陈天固是国民党党员,他撤销了我的任教资格,还出传票传我到县,最后我被阎务直请到临县任任教才脱了险。

1939年,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。阎锡山变抗日为和日,变联共为反共,发动了12月政变,动用六个军的兵力,向我新军展开全面进攻。我区由雒贵岐等同志成立了游击队和四区党委会,领导人民以民主的方式,选掉了反动的村长刘汝彩等人,我县牺盟会派来高明性同志任区长,迫使伪区长裴忠交出印来,区政权才到了我们手里。反动分子王树枝,又武装占领了区政府,我们的游击队赶跑了王树枝,再次夺回区政府(以后高明性调任六区区长)。

新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,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。仗打完后,一二〇师主力从冀中赶回晋西北,从此晋西北就成为屏障陕甘宁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。晋西北顽军和旧政权已被我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共斗争中基本肃清,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、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。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,贺龙同志任主任委员。为各级新政权的建立,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晋西南、北区合并,成立了晋西区党委,林枫同志任书记,开始了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。

1940年1月1日,离石县人民政府在石安村成立,共产党员梁延檀被公举为县长。中共离石县委改为“敌后工作团”,先由卫一清书记兼团长,后为张涛。并在“敌工团”领导下建立县抗联,崔映国同志任主任。

我四区由薛安居任区长,卜立功任“敌工团”书记兼团长,薛丕华任抗联主任。工会秘书武思问、农会秘书阎良田、青救会秘书王建林、妇救会秘书刘玉兰,我任教救会秘书。

早在1938年,日寇占领我离石、大武、柳林等公路沿线,造成了全县统一领导的困难。“晋西事变”旧军失败后,我党中央本着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原则同阎锡山谈判,双方和谈划定汾离公路南北为界,南属阎管区,北属我抗日民主解放区。为了武装保卫政权,除建立各村的抗日自卫队外,我县还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,由县委书记卫一清任政委。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,卜立功书记任指导员,我任文化教员。调薛安居同志任一区中队长,由康希禹接任四区区长。我区自卫武装成立后,抵抗日寇的扫荡,保卫区政权。还建立了站岗放哨制度。大力开展四大动员,发动群众参军参战、献金、献粮、献军鞋,支援部队抗日。通过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组织,进行革命教育,使群众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,在进步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,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。

二、抗战中期反对日寇 “扫荡”“蚕食”的斗争 (1940年——1942年)

晋西事变之后,日寇乘我四区抗日政权初建之际,接连向我区实行了空前未有的春、夏、冬三次大“扫荡”,妄图将我抗日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
1940年3月10日(农历正月二十五日),日寇从大武据点出发,对我东社村进行大“扫荡”。当时我在四区,胞弟李晋在二区跟雒贵岐开辟工作,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,把我家的房屋用具、衣被食粮,一火烧成灰烬。使我父母妻子弟侄等全家十五口人,无家可归,饥寒交迫,母亲受饿不日逝世,妻子离乡背井,逃出火坑,到我根据地参加革命,在三分区干属校工作学习。鬼子还烧了堂叔友泉、族侄学仁的几间房,并把村民都抢光,使全村人遭受饥寒。从此日寇对我区村,由“碉堡”政策进而为“囚笼”政策,如在我区店坪、石门碛和西属巴、张家山等村庄,后又延及临南的钟底、三交镇建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,来把我根据地县、区、村分割破碎,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县、区、村进行封锁,就是用公路这条铁链圈起来,再用碉堡铁锁锁住,使我军政民被迫分散,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。继而由围攻到“扫荡”,后来更用连续、反复“扫荡”,以及对我后方的急行奔袭等战术,来达到消灭我军民、蚕食我区村根据地的目的。

3月下旬,大武、石门碛之敌四百余人,再次向我离石四区、临县进犯。当时我区四大动员收到大部献金,为避敌抢走,我们政工人员、游击大队,背上献金,西向临南根据地马家山、秦局上一带打游击。敌人“扫荡”我区后,进犯临县湫水河,一路下至磧口绕小川,一路沿湫水河至白文镇,配合寄岚、五寨之敌反复“扫荡”,竟把我区、三交区游击队包围起来,在此危急情况下,我与三交区长阎继武同志取得联系,准备渡过小川到西河畔摆脱包围圈,不想小川已被敌人占领,我们日夜在山头准备与敌战斗,幸有我工卫旅、暂一师三十六团歼灭、击退进犯寄岚之敌,临县之敌闻讯撤走,我们才解围保全了献金。但是日寇在我区反复“扫荡”,烧杀抢甚惨,雒家庄烧了不少房,在南后庄虽然全村都搜遍连个人影也没见,但抢劫财物不计其数。

我区党政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,通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,一面坚壁清野,一面拿起武器,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。早在1939年10月,由雒贵岐、武泽开同志领导成立的第一个游击小组(后为——一五师二中队),在晋西事变前后,缴获阎伪区公所步枪四支,又在打溃兵夺武器运动后,各村自卫队都有了武器,从新政权建立起,这些游击小组、自卫队,在反“扫荡”、掩护群众转移、坚壁清野和配合正规部队攻袭石门碛敌据点的战斗中,逐渐发展壮大起来。他们除站岗放哨、掩护群众脱险,保卫其生命财产外,还能采用游击战术和小股敌人作战。

我区处在靠近敌人的最前沿地区,日寇的每次大“扫荡”,大武、石门碛之敌,必先经四区才能深入我内地。因此,当时敌我双方拉锯式的战争是非常紧张激烈的。我们首先加强了区游击队和各村自卫队的工作,开展分散游击的战术,对付敌人的碉堡政策。破坏敌人交通,在敌人出发必经之险要大道挖开壕,并埋上地雷封锁敌人,砍电杆、割电线断绝敌人联系,三天两头袭击石门碛敌据点,使敌人坐卧不安,一般不敢出动。

为防止敌人偷袭和黑狗子、汉奸的活动,我们还组织自卫队、妇女儿童,坚持站岗放哨查路条,日夜轮流不放松。为加强放哨,我特意编了十首妇女放哨歌,其一:“时到五点钟,太阳从东升,小妇女来放哨,盘查行人路”,采用了绣荷包曲谱。我还从牺盟会抄来一首儿童歌曲:“小兄弟,小姐妹,大家齐步向前跑!跑跑跑,跑跑跑,一跑到山岗上,齐将敌人杀!……别说我们年纪小,救国的责任,要我们来担当,凶恶的敌人,要我们来打倒”。把这些歌让小学教师教唱,并在各村都设立扫盲识字牌,在黑板上表扬好人好事和抗日新闻等。例如东社的李根香(现在四川)、白

改则当时都是妇救会的好干部。当时我区的民兵、妇女和儿童非常活跃,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大刀红缨枪,口里唱着自己的歌,碰上来人必查个水落石出,还要认识字牌上“打出日本去”……的字才放行。农会组织男人勤耕作,改善生活交公粮;妇教会发动纺织做军鞋,儿童团侦察敌情送情报;青救会组织民兵游击队,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。

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,杀我人民,捕我壮丁,以摧毁我根据地内的人力,烧我房屋,抢我粮食、器具、财物,以破坏我财力物力。1940年6月12日,敌人以两万余兵力,采用“分进合击”的战术,开始了对晋西北的夏季“扫荡”。我工卫旅“避开合击”,二十一、二十二两个团与敌人周旋在交城山区。根据敌工组内线情况得知这一情报,我区游击队、党政人员(留守一部分坚持领导各村工作)和二区区长雒贵岐、助理员李晋及决死四纵队教导员高日升和两个排长共数十人,组成一支战斗队。除了老高的好手枪、冲锋枪外,我们的是步枪、牛枪、手榴弹,还有土枪大刀。每人一个米粮袋,装的是炒豆、莜麦、糠炒面。这支战斗队由卜立功、薛丕华、高日升和区长康希禹领导。石门碛之敌向西进犯,我们就从敌碉堡东进,冲过离方封锁线,跑步到达吕梁山主峰上的一个小村庄驻扎。老薛叫我负责民运,开展抗日救亡必胜的宣传,发动群众参军参战。一个月的时间内,在五区征集送走三批兵员。征集还要进行,敌人西进反击回来包围了我们,正在想法突围的时候,刚好我工卫旅某部从两夹圈来,接火冲杀敌人,才使我们冲出包围圈,上了东山一个小庄,天黑才将带的午饭吃了。翻过山将进史家沟,村口哨兵打了连发信号枪,老卜说这是五区游击队,叫派人去联系,我说:“我去吧!”快进村时我忽然想到连发枪可能是敌人,忙退出问老卜:“咱先喊话再联系,行吗?”老卜很同意,爬到村口地坪上去喊话:“四区老卜来了,你们是五区游击队吗?”

喊了几次不应声,再静听,听到有洋马啃草声,肯定是敌人,我们马上隐蔽在村口坡地上,准备战斗。但敌人已出发到了村口,决死队排长扛支冲锋枪,手拉着枪栓让敌人站住。我们的步枪、牛枪都拉栓推上子弹,作好射击准备,手榴弹导火线都拽出来套在手指上,准备和敌人打一场夜间遇战。哪知敌人不敢接火,停了一下顺沟走了,在北山扎营下寨。我们尾随敌人上了半山腰,怕吃亏只好返回史家沟,上了南山天刚亮。白天,为了防备敌人炮击和搜山,三五分散,保持联系,每天都有敌机来空袭,但由于灌木林浓密,我们隐蔽的好,没有被敌人发现。在山上吃的是糠炒面,渴了就喝冷水。尚德同志行军中掉了队,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。后来找到部队,他说炒面早已吃完,找不到部队快要饿死了。

原来,这股敌人是从吴城据点来的,分进合击我交城山上的工卫旅,被我们牵住牛鼻子,七八天不敢前进。对我工卫旅歼敌取胜起了配合作用。

当战斗队返回小东川时,只见地里庄稼成了放马滩,群众逃难尚未返家,村庄被烧成瓦砾废墟,万恶的日本侵略者,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啊!我们穿过吕梁主峰两夹圈,抢渡峪口敌人据点,绕道临县端头返回池家沟,才知我母亲饿死入土已经月余,我弟兄两个化悲痛为力量,决心为抗日不怕牺牲奋斗到底。

同年五月,我区为了开展对敌斗争,抗联郝廷龙等同志在自家山组织了几个村公所的干部开会,有冯家坡村长侯国岐,白家山村长李全信、文书李珍、教员李元学,班家洼村长雒鸿斌,东社妇救会李根香、白改则,民兵李富珍、李修俊和后庄李编根、部队老王等同志。不料汉奸xx报告了大武的敌人,当天晚上出动包围了自家山,我民兵和同志们奋起反击。在激烈的战斗中,族弟李富珍、外甥李缠根光荣牺牲。郝廷龙、雒鸿斌和老王三同志被捕后,敌人严刑拷打不屈服,英勇就义。当时我李家山驻军某部闻讯赶到,击退敌人,干部民兵群众解围后镇压了汉奸。

(据《吕梁党史资料》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)

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(一)

党史天地

市委党史研究室
(市地方志研究室) 联办
吕梁日报社

